

学术动态

中国古代文论讨论会

探讨古代文论中的现实主义及其艺术规律问题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术讨论会最近在武汉大学举行。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全国各地大专院校、科研、刊物、出版等一百个单位共一百六十多名代表。这次会议的主题是，树立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明确目标，继承中国古代文学理论遗产，建立具有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会议根据周扬同志的提议，着重讨论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的现实主义问题和其他艺术规律问题。

与会者认识到建立具有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认为：长期以来，我们的文艺理论研究工作所受干扰极为严重，有的把理论研究搞成了文艺政策的说明，有的则利用古代

文艺理论遗产作牵强的比附，特别是对自己民族的文艺理论体系缺乏科学的、系统的研究。我们需要建立具有民族形式和社会主义内容的新文艺，而我们的文艺理论研究工作远远不能适应新文艺的发展。因此，当前提出建立具有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意义是很大的，也是古代文论工作者的长远努力目标。

关于古代文论中现实主义问题：

有的与会者提出，我们在研究现实主义问题时，忽视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信中那段关于现实主义的著名论述是不对的，然而，把这段话作教条主义的理解，甚至作为普遍的现实主义定义也是不行的。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的言论，是以小说为对

群书社的成员，于六十年后还能清晰地回忆到当年陈独秀身着灰色长袍、戴着围巾、妙语如珠、侃侃而谈的情景。当时的记者包惠僧曾多次访问过陈独秀。包惠僧说：“我和陈独秀一见如故，多次交谈并和他讨论社会问题。”陈独秀离汉后，包惠僧和工人郑凯卿同陈独秀经常通信联系，以后湖北成立第一个中共支部时，由于陈独秀的推荐，包惠僧和郑凯卿都成为这个支部的第一批成员。郑凯卿还是这个支部成立初期唯一工人成分的成员。包惠僧在一九七九年二月底回忆当年陈独秀离开武汉后他们的通讯时说：“我保留着他的信，可惜在十年浩劫中都烧了。”

武汉各界人士对陈独秀的演讲十分拥护和欢迎，使湖北的军阀大为震惊，急急忙忙下令停止其活动，迫其及早离汉。陈独秀被迫提前于二月七日晚离汉乘车北上。行前陈独秀还出席了汉口下段保安会的欢送会。

陈独秀第一次来武汉，从二月四日至二月七日共四天，时间虽然不长，却是繁忙的四天，是生气勃勃的四天。陈独秀这次来武汉，对武汉地区的新文化、新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对他思想的转变，知识分子与工人群众的结合也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① 《新青年》2卷6号。

②③④⑤ 《时事新报》1920年2月2日。

⑥ 《每周评论》第16号。

⑦⑧ 《国民新报》1920年2月7日；2月9日。

⑨ 包惠僧于1979年2月底的回忆。

象，而又以十九世纪中叶在西方出现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经验为依据的。它只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特定文学样式的创作经验的概括，并未反映一切国家，一切文学的普遍规律。所以，我们总结中国古代文学的规律问题，只能以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的理论作参考，更重要的则是从中国古代文学本身的情况出发，来进行具体分析和探讨。因而他们不同意这种观点：即套用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的定义，从而断言在我国文学史上，只是在《水浒》等长篇小说出现以后才有现实主义。

有的集中论述了中国古代诗论中的现实主义问题，指出：先秦两汉时代关于《诗经》的许多论述是现实主义诗歌理论的萌芽阶段。《尚书·尧典》中的“诗言志”、“歌永言”，孔子的“兴、观、群、怨”说，以及《毛诗序》中的论述，为我国此后的现实主义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确立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至汉魏六朝、隋唐，这种理论随着诗歌创作经验的不断积累而不断丰富和发展。刘勰旗帜鲜明地肯定“为情而造文”、“要约而写真”的《风》、《雅》，批判“为文而造情”，“淫丽而烦滥”的“辞人赋颂”，其目的在于反对晋宋以来脱离现实的形式主义诗风。而唐代陈子昂、白居易等人“以复古为革新”的现实主义诗歌理论，同刘勰的现实主义诗歌理论也是一脉相承的。而杜甫的诗歌创作，则标志着现实主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一个新阶段。

有的同志系统地阐述了自己对我国古代写实派文学理论的看法。指出：在中国文学史上，从来就存在两种不同的文学潮流，以《诗经》为代表的文学传统就是“写实派”文学。《诗经》以其与具体物象相联系的“赋、比、兴”方法开其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乐府诗继其绪。在汉代，王充提倡“实事”以反对“华文”，提倡“实情”以反对“矫情”，提倡“真美”以反对“虚妄”等等，进一步阐明了写实派文学的一些重要特点。至魏晋南北朝，理论家们对写实派文学的创作规律则作了进一步概括。陆机在《文赋》中主张把广阔的空间、纷纭的现实统一在有限的形象之中，而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篇中则提出了“以少总多”的典型化方法，这是一个重要发展。钟嵘强调写实派文学对现实生活的直接依赖性，以严格尊重生活的真实和用生活本身的形象来反映生活作为写实派文学的标志。至唐宋，杜甫继承《诗经》的创作传统，首先是注意“写真”，也注意“写神”，他的创作经验被凝聚成“以形写神，形神兼备”，后来成了写实派文学家奉行的圭臬和追求目标。明清两代写实派文学理论又有新的发展，这种发展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因素日益滋长，市民阶层逐渐扩大，以及小说戏剧的繁荣而形成的，这时现实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现实主义理论又具有新的特点。

与会者在讨论中大胆陈述自己的见解，平等讨论。有的赞成广义的现实主义和狭义的现实主义的提法，认为广义的现实主义不仅仅指小说、戏剧这类有人物情节的作品，而且可以概括诗歌，散文这类具有现实主义描写的作品。用这个论断去研究探讨中外文学史，可能比较切合实际，对各种不同样式的文学作品特征都比较适用。有的则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广义的现实主义”概念既不能科学地解释中国古代文学现象，又不能科学地整理中国古代文学现象，而且给中国古代文学、古代文学理论的研究带来了两种不良倾向：一是不适当地肯定了許多不应当肯定的东西；二是不适当地否定了不少应当否定的遗产。

有的认为导源于汉代的以政教为中心的诗论接近现实主义。这是因为诗歌是社会现实的反映，但现实的反映不能就成为现实主义；只有自觉、积极地反映现实，才是现实主义的开始。而政治是社会中的最大的现实，也可以说，政治是现实中最主要方面，为政治服务的诗是关心现实、干预现实，积极地反映现实的重要表现。因此，它和现实主义的要求，完全一致。以政教为中心的诗论，虽然在理论上达不到上述要求，但从创作实践上看，在《诗经》、“汉乐府”，以至陈子昂、杜甫、白居易的诗集中，就有大量的可以称为现实主义的作品。有的则持不同意见，认为把儒家的“教化中心”论误认为“现实主义”理论是不对的。因为关心现实，干预现实，积极地反映现实既是现实主义文学也是浪漫主义文学的共同特点，而不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唯一标志，仅仅从文学的社会作用而不结合文学认识生活反映生活的特点来探讨创作方法的规律是不足以说明问题的。

对我国古代文论中具有民族特色的艺术表现规律问题，与会者也进行了有意义的探讨。

关于“风骨”问题 对“风骨”一词的来源及其发展，有的认为从魏开始出现“风骨”一词，是“风”和“骨”连缀而成，一般指人的品格而言，把“风骨”作为文学创作的审美标准，刘勰是第一个人。他是吸取了书法“风骨”论的特点而建立起来的。有的认为，论人物的风骨，论书画的风骨和论论文的风骨，都是取其比喻义。无论是评人物的风骨论，还是评书画的风骨论、还是评诗文的风骨论，都属于美学范畴，都表现了各个方面的风格特点，而这些风格特点表现在人物品评、书画品评、诗文品评中都有很大的类似性，“风骨”并不是刘勰在《文心雕龙》里特创的名词。对风骨的内涵应如何理解，则有三种看法：一种认为刘勰的“风骨”论指的是文艺具有清新、刚健、明朗、壮丽等美的特点，大致相当于后世批评家所说的“阳刚之美”的艺术风格。二种认为刘勰之“风骨”，既不同于刘勰以前的“建安风骨”，

也不同于唐初由陈子昂首倡的“汉魏风骨”，而是“以佛统儒，佛儒合一”之道的思想感情和语言体式的“风骨”。它是作为一个审美标准提出来的，“风清骨峻，篇体光华”八个字，则是这一审美标准的说明。三种认为刘勰的“风骨”应是作品的情、理、文三者的结合，是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统一。

关于“文气”问题 对“气”的含义有的指出，这个术语原来的含义一是古代朴素唯物论者认为气是一种自然物质，如柳宗元《天对》：“本始之茫……惟元气存”，二是指人身的气，也是自然物质，古人以为充满人体内的是气，它是生命力量的来源，如《管子·心术下》：“气者，身之充也”。由天地自然之气到人身自然之气的物质命题，进入到精神的命题，随之而来，便用“气”这一名称来品评人物，更进一步又把“气”作为文学理论术语。有的认为，“气”是我国古代文论中所专有的术语，是具有民族特色的一个独特的概念。尽管对“气”下一个确切的定义很难，但纵览历代文论家对于“气”的论述，以及运用“气”对作家及其作品的评述中，可以认为“气”，是包含在作品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统一中的一种高尚素质，是艺术家内在的精神力量，也即作家的气质，他的思想见解、美学理想、襟抱品性、道德修养等在作品中的体现。它看不到，摸不着，只可意会而不能言传。它虽非玄妙，然与文意相比，确有虚实之别。但文得“气”便厚，“气”之对于诗文，确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关于“意境”问题 与会者认为，从古为今用来说，分析古代文论中揭示文学内部规律的术语学说，“意境”说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有的指出，所谓“境界”“意境”、“滋味”，或一般常言的“诗情画意”，实际上是有情有景、有声有色的美学形象和美学世界，是比现实有所增加有所提高的艺术意义，艺术世界。有的认为在古代文论中“意境”说包含着意境的涵义、美学意义，意境的创作过程与技法等丰富的内容。意境是意与境的融彻浑成，是创作三要素：主体、客体与表现手段内在关系的理论概括。意境说是在漫长的文学创作与文论研究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孕育于魏晋南北朝，《文赋》为其理论渊源，《文心雕龙》与钟嵘《诗品》开了

先河，形成于唐，广泛运用并发展于清，至今沿用不衰。在文艺评论的实践中已经成为具有民族特色的美学范畴。意境的形成，始于作家对客观事物的观察体验、蕴孕情志，在构思过程中提炼、撷取独特的、足以表达诗人特定情志的意象，用富有特色的、凝炼的、具有音乐美的语言，采用多样化的手法表达出来。

对于批判与继承问题，与会者也发表了一些新的见解。有的认为，我们祖先在几千年的文艺实践中，积累了极为丰富的文艺经验和理论，对这一笔既有精华，又有糟粕的丰富遗产，决不能采取简单地一概否定或一概肯定的办法，也不能简单地把它们分成“民主性精华”或“封建性糟粕”，如果简单地用“封建性”和“民主性”作标准来决定对文化遗产的取舍，就容易形成一刀切、简单化。有的认为，长期来流行着这样一些说法：什么破字当头、大批判开路、等等，这些话是不对的、有害的。早在先秦时代，就存在集大成的思想，兼收并蓄的思想。兼收并蓄并不是无批判的，但在研究遗产时，首先就要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到后头才是有批判地兼收并蓄，正如鲁迅说的，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拿来再说。解放后，我们批判形式主义、唯心主义、唯美主义，批判后，又把它们贴上标签，束之高阁，结果我们很多东西都被排斥在文学史外。即使提到它们，也是完全加以否定的，如汉赋、齐梁时文学作品、骈体文、西昆体、词里的婉诗词，明朝前后七子、公安、竟陵、清代的桐城派、曾国藩的湘乡派。这样，就把这许多文学流派中可以保留的某些东西，还没有拿来，就统统去掉了。

这次学术讨论会是由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湖北省文联和武汉大学筹备召开的。大会收到了六十多篇学术论文。八十八岁高龄的老教授郭绍虞会长作了书面发言。全国文联党组第一副书记陈荒煤、著名学者钱锺书等发来了贺信。出席这次会议的知名教授、学者李俊民、王起、郝御风、钱仲联、顾学颉、舒芜、姚莫中、徐中玉、詹璞、王达津、马茂元、霍松林、王文生、敏泽、缪俊杰等在会上作了学术报告或发言。

(吴高福整理)

唯理论和经验论哲学讨论会综述

为促进全国哲学工作规划中所定重点项目之一《西方哲学史》(多卷本)的编写工作，继古希腊罗马哲学讨论会和德国古典哲学讨论会之后，由中国社

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北京大学哲学系及外国哲学研究所、武汉大学哲学系和湖北省哲学史学会联合发起，去年十月四日至九日在我校召开了唯理论和